

先秦两汉赋税思想史论



周道生 著

赋税思想史论



周道生 著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92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97
F812.92
7
2

先秦两汉赋税思想史论

周道生 著

XDK78/05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



C 263402

湘新登字 010 号

先秦两汉赋税思想史论

周道生 著

责任编辑:童芳远

*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建五局五公司印刷厂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67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

ISBN 7-81020-864-0/F·159

定价: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生产厂家联系解决

内容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先秦两汉赋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十字坐标法对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和发展分期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和概括。着重对先秦两汉的赋税思想发展的时代特征、各主要代表人物的赋税思想的观点、理论进行了深刻分析,实事求是地、历史地评价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本书还特别注重分析阐发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哲学、伦理道德观点对理财家的赋税思想的影响,而且对诸多传统经济思想史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对儒家和道家学派在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新的评价。

序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中,经济思想遗产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掌握国情,对制订当今发展的战略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如“以农为本”的思想,其正确性与其缺陷,就至今仍值得我们加以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尚待深入之处尚多,特别是对其中某些影响着我国古代经济发展较为巨大的理论、政策问题作分门别类的、系统的探讨尚有待努力,赋税思想即是其中之一。周道生同志《先秦两汉赋税思想史论》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缺陷,我认为,这对推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生产以农业为主,国家对生产的管理当然不可能象今天这样的复杂,但其干预还是多方面的。如兴修水利、积谷备荒、奖励垦殖……以及对某些工商业实行官卖、官营等,都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而作为国家指导、调节生产的主要手段则是赋税。一个朝代的赋税政策往往是衡量那个朝代经济是否发展或停滞的重要尺度,某种赋税理论也是衡量某种经济思想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权衡。因此,我们研究某种赋税思想不能孤立地去进行,而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和提出那种赋税理论、政策的人物的全部思想加以分析、判断。道生同志在这部著述中是努力这样做的。故此书涉及了较广泛的学术领域。但著者又不受某些现成结论的束缚,他始终把握着赋税思想作为考察的主干,力图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找出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本书绪论中对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特点的概括,即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其对中

国赋税思想的分期,不完全按照历史学家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级的划分,而是从赋税思想的形成、发展的特点出发,把它分为六个阶段,也有独创性。此外,在各个专家的论述中也有不少新见,如力辨孔、孟、荀三家赋税思想之不同,对道家赋税思想作了高度的肯定。作者认为道家的“无为而治”,完全是为了反对统治者的虐政扰民和胡作非为,以使人民过上安稳的日子。而不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并指出道家学派主张消灭私有制和贫富悬殊的现象,提倡轻税,反对重税。道家学派还是科学和民主的先驱,道家“均贫富”的思想,成为后世农民起义的思想旗帜。作者肯定道家学派是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作者的见解均有惊人之之处。他这些新见,不一定都完美无缺,然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其对赋税思想的分期,尤为深思熟虑,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赋税思想演变的历史,对治中国经济史也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我国古代文化有个特点:文、史(包括经济史)、哲往往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也必须加以旁通和贯串。周道生同志本是学中文的,又长期在税务专科学校任教,需要熟悉有关经济的理论和历史。这在客观上为他创造了旁通的有利条件;而他又主动地利用了这个条件,一九九二年曾与人合著了《中国古代赋税典选析》,在精熟赋税典籍上下过扎实的工夫;故能写出这样史论结合的著作。我既叹赏他在学问上的精进不已,更为他已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故趁其新著出版,写了上面的感想。

马积高

1996.4.6.于岳麓山下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史的分期	(16)
第二章 夏、商、西周的赋税思想	(57)
第一节 《尚书》的赋税思想	(59)
第二节 《周易》的赋税思想	(62)
第三节 《周礼》的赋税思想	(65)
第三章 一个具有两重性的历史人物——孔丘的赋税思想	(71)
第一节 一个具有两重性的历史人物	(71)
第二节 “畏天命”的世界观和重“仁爱”的社会观	(74)
第三节 保守复旧的赋税思想倾向和主张轻徭薄赋的 开明思想	(76)
第四章 平民、自耕农的思想代表老子的赋税思想	(83)
第一节 平民、小私有者和自耕农利益的忠实代表	(83)
第二节 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奠基者 ...	(86)
第三节 提倡“无为而治”为新兴地主阶级提供长治久安的 治国方略的伟大政治家	(92)
第四节 提倡“少私寡欲”与平均主义的赋税思想家	(101)
第五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旗手	(105)
第五章 民平、小手工业者的代表墨翟的赋税思想	(114)
第一节 提倡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生而知之”的哲学家...	(115)
第二节 提倡平等和民主的伟大思想家	(119)
第三节 提倡“常征”反对厚敛的平民赋税思想家	(121)
第六章 中国古代第一部最完整的经济巨著《管子》的赋税思想...	

.....	(128)
第一节 《管子》的义利观和“富民论”	(129)
第二节 《管子》卓异独特的赋税思想	(135)
第三节 《管子》的法治思想和依法治税论	(146)
第七章 新兴地主阶级的民主思想家孟轲的赋税思想	(150)
第一节 新兴地主阶级的民主思想家	(150)
第二节 确立道德统帅财利的地位的义利观是其赋税 思想的灵魂	(156)
第三节 以“仁政”为纲是其赋税思想的基本特点	(160)
第八章 伟大思想家荀况的赋税思想	(174)
第一节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重要 作用的伟大思想家	(175)
第二节 最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 制主义理论奠基者	(179)
第三节 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赋税思想的主要成果 开启秦汉统一后赋税思想发展的新方向的赋税思 想家	(188)
第九章 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法家学派的赋税思想	(199)
第一节 商鞅的赋税思想家	(199)
第二节 韩非的赋税思想	(206)
第十章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赋税思想	(213)
第一节 宣扬“皆为利”论,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	(215)
第二节 在赋税思想上,反对向老百姓横征暴敛不赞成 兴利之臣	(217)
第十一章 最有魄力的地主阶级理财家桑弘羊的赋税思想	(220)
第一节 重商理论	(222)
第二节 改革财政赋税制度的重大措施	(223)
参考文献	(228)
后 记	(22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

中华民族有着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她创造和积累了异常丰富和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在整个历史文化遗产中,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居极为重要的地位。一个时代的赋税思想往往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的核心部分。并且与一定历史时代的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观点以及政治、法律等制度密切联系着。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对赋税思想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时,就不能不注意影响一个时代赋税思想发展的诸因素。

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古代赋税思想是指自周代至清末三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地主阶级的赋税思想。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准确地说是西欧历史发展)方向大致相同,都经历过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又有它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奴隶社会也未得到充分发展,唯有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却经历了悠悠三千年,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漫长。在三千年封建社会中,其政权的基本形式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专制主义的统治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哲学、文艺、伦理道德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我们讨论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时,就不能不注意这一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充分注意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权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

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的角度来分析,我认为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特点在五个方面。

一、国家本位的赋税思想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重在从经济上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政权的统治,其赋税思想学说着重论述“富国”(即充实封建朝廷财政),而较少论及“富家”(即富民,而“民”主要是指小土地私有者),重在对国家宏观的赋税管理思想的论说,而很少有微观的具体的赋税政策和理论的论述。

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中叶在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家中,以法家为代表的学派其学说主要是为从经济上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政权大造舆论;而以儒家为代表的学派的理论主要是为挽救旧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经济改革造舆论。特别是战国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伟大时代,当时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在急剧地变化着,曾一度强大不可一世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土崩瓦解,而以前处在幼弱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迅速变为强大者。真可谓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整个社会处在波澜壮阔的大变动时代,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赋税思想积极为建立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服务,为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和巩固政权大造舆论。秦国的商鞅是中国古代法家中真正的法治主义者。他的赋税思想理论完全是为巩固新兴地

主阶级的经济地位,确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奠定经济基础服务,他断然提出了“富国贫民”论。他说:“强者必富,富者必强,”^①他把富国、强国和治国当作同义语。他认为只有富国才能达到强国的目的,因此,他主张“上藏”,即在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上尽量扩大国家所占有的份额,主张重征赋税。他认为民富了就不会努力生产,就不会听凭政府的驱使,就会佚乐。民贫才会致力于农战。民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所以他提出“家不积粟”,要使一家一户除有供食用的粮食之外不得有任何剩余,剩余的粮食必须集中在国家手中。在他看来,富国是主要的决定的方面,而富民则是从属于富国的,他认为要想国强,就要使民在贫富之间运动。他说:“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②儒家学说虽然口头上也说“藏富于民”,但实际上也是提倡“富国库”,充实国家财政收入。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大肆鼓吹“贵义贱利”,企图要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以服从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即朝廷的利益,皇帝一姓一家的利益。历代统治阶级在赋税思想上只讲征收赋税,以充实国家财政,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人注意富民之术,只有西汉的司马迁比较重视富民的问题,正确地说明了富民的意义和途径,把富国和富民统一起来。但是,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不被人重视,更未得到推行。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都征收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朝成年男子“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口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即一个男丁一生要服役一年。交纳田租,人头税和盐铁税,比古代多二十倍,租种富豪大户人家的田的农民,要向地

① ②《商君书·立本》

主交纳一年收获量一半的田租。汉代农民负担的赋税徭役与秦代差不多,正如董仲舒所说:“汉兴,循而未改。”董仲舒虽然提倡“薄赋省徭”,但其目的还是从维护封建秩序和巩固封建地主专政出发,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农民不致因不堪负担的赋税和徭役而大批破产逃亡,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其目的还是“富国”。

特别是历代的理财家的赋税思想理论,大都是论述赋税管理的政策、方针。很少有涉及赋税征收的具体做法。即微观上的理论和思想。象西汉著名的理财家桑弘羊,唐代杰出的理财家和赋税思想家刘晏都没有论述赋税问题的理论专著,前者的赋税观点见于后人桓宽著《盐铁论》,后者的赋税观点见于《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晏传》。刘晏几乎没有留下论述赋税问题的专论和专著。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二、赋税思想理论零散而不完善

在中国近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贵义贱利”的儒家正统思想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孔丘和他的追求者大力宣扬“讳言财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陈腐教条,在封建统治集团中长期存在鄙视经济工作的牢固偏见。在他们看来,经济工作只不过是他们的家臣甚至奴仆们干的事。如果让他们这些“高贵”的人自己来处理或过问这类事,就有失体面和身份。因此,历史上一些杰出的理财家从来就被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视为“争利”和“好利”之徒,为封建时代的士君子所不齿,他们的著述也很少传世。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哲学、法律、伦理等意识对中国古代赋税思想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以地主经济为核心的封建经济制度长

期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表现得不够显著。相反,在封建制生产方式中,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起着突出作用,广大人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愚弄的社会地位。封建统治阶级对如何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发展社会经济的问题,普遍都不重视,甚至不屑一顾。他们却十分迷信体现暴力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用以恫吓、愚弄、麻醉人们的宗教和伦理道德说教的威力。所以,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古代赋税思想理论的著作和文献资料极少或很不完备。而且往往是支离破碎的,散见于古代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甚至文艺等全部古籍中。几乎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有关赋税理论的著作。中国古代赋税之滥觞,是《尚书》中的《禹贡》篇。《禹贡》是世界上现存最早而较为完整的有关赋税资料的文献,而《尚书》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著作,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的典章制度及统治集团有关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的讲话。在先秦的古籍中对赋税思想记载较为详细的是《周礼》,相传为周公旦作。这是一部儒家的经典。但这部典籍所记载的主要是古代封建国家的官制和政治、经济制度。以政治、哲学论文为主。只是其中的《考工记》记载的经济思想资料较丰富,至于先秦诸子中的《论语》、《老子》、《墨子》、《管子》、《孟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有关赋税思想论述较为深刻、详尽、系统的仅有《管子》一书。《管子》是一部托名管仲所作的古代经世巨著,但并“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有的篇章成于春秋末期,有的篇章成于西汉时期,大多数篇章成于战国中后期。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论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关财政赋税方面的篇幅大约有四分之一左右。是先秦诸子中一部最杰出的经济巨著。至于其他各家,如孔子、老子、孟子、墨子,他们的著作主要

是有关政治、哲学、教育、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论述。很少有赋税思想理论的专著,甚至较为系统的论述赋税思想的篇章亦不多见。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光辉历史巨著——《史记》中,给后世留下了深刻而丰富的经济思想和赋税思想。但也只有《平准书》、《货殖列传》这两篇经济史论,与卷帙浩繁,洋洋数十万言,共 130 篇的《史记》全书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西汉著名的经济改革家晁错、桑弘羊也没有什么有关财政赋税思想的专著留下来,前者只有一篇《论贵粟疏》,后者的赋税思想限于桓宽记载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二月在京城长安召开的盐铁会议情况一书——《盐铁论》。而桑弘羊本人却没有任何有关财政赋税思想的专论或专著。唐代的刘晏,掌管唐代财政二十余年,他是封建社会极盛时期社会实际的改革家和理财家。但他没有一部论述财税问题的著作留下来。他的赋税思想主要散见于《新唐书》的《刘晏传》,以及《全唐文》中的刘晏的奏疏。宋、元历朝虽有许多杰出的理财家,但也没有较为系统的有关财税思想理论的专著。明清之际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比较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他们有不少论著是研究当时赋税制度的,其赋税思想较为丰富,但他们的学说主要还是在政治、哲学方面,“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所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有关赋税思想理论的文献资料比之哲学、政治、军事、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的著述就少得多了,且零散而不完善。

三、以国家经济干涉主义为中心

以官营专卖的形式垄断市场,禁止自由经营,限制和摧残私营工商业,以官营专卖收入代替工商税收收入。以官营专卖的

政策、法令代替赋税政策和理论。

在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史上,主张国家经济干涉主义和官营专卖的赋税思想与提倡经济自由主义,力主私营,反对官营专卖的赋税思想的斗争,一直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的始终。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史除对田赋、徭役有比较翔实的理论和具体政策外,赋税思想理论主要反映在盐政、漕运、屯垦和轻重思想上,而主张发展私营工商业和鼓励自由贸易,维护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赋税思想理论和税收政策的著述极少。

在悠悠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的赋税思想一直是主张经济干涉主义,推行政府统制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官营专卖政策占主导地位,而封建统治集团醉心于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地主政权,根本就不关心如何按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发展社会经济。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建立和巩固极权政治,要求经济发展必然服从于他们的极权政治。否则,宁可民不聊生、经济崩溃。自古以来,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都是互为表里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必然伴随经济干涉主义,即由政府统制一切经济活动,实行国营(官营)的专卖政策。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真正的法治主义者商鞅,为了彻底扫除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建立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就提出了以“农战”为核心的赋税思想,对有利于农战的一切活动一律鼓励,对不利于农战的活动都一律限制和坚决打击,实行以官爵劝农战,“作壹而得官爵”,“利出一孔”的政策。推行有利于农战的赋税政策,勤于农事者可免除徭役,减轻农民租税负担,对农业以外的一切行业一律采用重税政策,主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税必重”,加重关市之赋,加重酒肉之税,加重一切市场营利的捐税。他甚至严厉禁止商人从事粮食买卖,禁止人民利用山泽从事虞渔,迫使一切人们归于农业,“废

逆旅”、“壹山泽”把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总之，政府统治了一切经济活动，使全社会都归于地主阶级的一个权力中心。因此，商鞅的赋税思想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确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随着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经济干涉主义和各种专卖政策越来越占主要地位。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桑弘羊，在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巩固后，推行了以盐铁专卖为主的一系列经济干涉主义政策，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外，还实行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重大财税政策措施，国家垄断全国市场，管理和控制物价，而且还掌握了山林川泽的自然资源，“开园地，总山海”，控制了山林川泽的财利，把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经济权益，完全集中到封建国家的政府手里，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收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经济效益。桑弘羊的赋税改革措施，从经济上巩固了封建中央专制主义政权。从此，重农抑商，经济干涉主义的赋税思想使中国沉沦于静态的农业社会二千余年，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汉末年，王莽把重农和经济干涉主义的赋税思想推向极端，这就是他的“王田”制和“六筦”政策。他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下诏“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禁止田地自由买卖，把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并实行限田，以抑制土地兼并。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又行“六筦之命”，“命县官酤酒、卖盐和铁器、铸钱，诸采收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命市官收贱卖贵，赊贷子民，收息百月三。”即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且具有垄断性质的商品均实行国家垄断的专卖政策，实施彻底的经济干涉主义政策。王莽由于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统得过死，严重违背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他的经济改革成为扰民困民的苛政，祸国殃民，导致了政策的失败和新莽王朝的灭

亡。唐代著名的赋税思想家和杰出的实际理财家刘晏在改革唐代财政赋税时主要是从转运、盐法、常平三个方面入手,除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的转运政策外,其余的政策都是加强封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他的就场专卖食盐的盐税改革和把常平制度所经办的业务扩大到经营“万货”的常平制度政策,都是把财利集中于中央的经济干涉主义。而他几乎没有任何运用税收政策以发展私营工商业和鼓励自由贸易,维护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赋税思想理论。因此,刘晏管理李唐王朝财政几十年,却没有关于赋税理论的专著传世。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儒家传统的赋税思想开始动摇。以李觏、王安石为代表的赋税思想家公开斥责儒家的“贵义贱利”的思想,极力宣扬“均节财用所以为义也”的观点,主张讲求财利。但是,他们在摧抑兼并的政治口号下,推行国家垄断财利的一系列专卖政策,只是在盐、铁、酒等物的专卖问题上比汉唐时期稍有放松,经济干涉主义倾向稍有松懈。明、清时代的理财家和赋税思想家如张居正、李贽、黄宗羲、洪亮吉等对封建的正统赋税思想均有所批评,反对国家专卖政策和经济干涉主义的思想倾向日益增强。但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统制仍然严厉。

四、重视赋税管理制度和赋税机关的建设

从唐宋以来,封建统治者尤为重视对赋税官吏的选拔,把养拔廉能,清除贪渎放在整顿和建设财税机关工作的首位。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向来比较重视赋税管理制度和财税管理机关的建设。

最早论述先秦封建国家政权的组织、机构人员设置和职能的经典《周易》,就对封建国家的赋税制度和国家赋税机关有较